

东亚汉诗中的维扬书写——以清代琉球文献为研讨中心

陈宇博

扬州大学 江苏扬州

【摘要】维扬地处运河水路交通节点，经济文化自古繁荣，不仅在本国文学作品中多有书写，同时也作为文学符号传至东亚汉文化圈各国。以琉球文献为中心，东亚各国汉诗保留了大量维扬书写内容，呈现了汉文化的异域流播情况。露筋贞女叙事历经改造，最终以儒家教化工具的面貌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并融入东亚烈女叙事网络；以琉球汉诗为代表，维扬诗作中体现出藩国文人的“第三空间”处境，作品时常流露出对中琉两国的“双重忠诚”；同时，出于作者的身份语境叙事，维扬书写内容也表现出多元性。

【关键词】琉球；维扬；东亚汉文化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长江职业技术学院长江书院韩宝忠研究专项课题 2024 年度重点项目：“《不如痴斋诗草》与晚近社会研究”（项目编号：HBZ005）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88

The depiction of Weiyang in East Asian Chinese poetry: a study centered on Ryukyu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

Yubo Che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Abstract】Weiyang, located at the nodal point of the Grand Canal's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has long been a hub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ts significance extends beyond domestic literary works, as it also emerged as a literary symbol disseminated across the East Asian Sinosphere. Focusing on Ryukyu documen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bundant depictions of Weiyang preserved in Chinese poetry from various East Asian countries, revealing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Han culture. The narrative of the "Lujin Chaste Maiden" underwent reinterpretation, ultimately serving as a Confucian pedagogical tool in literature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broader East Asian network of chastity narratives. Represented by Ryukyu Chinese poetry, works related to Weiyang reflect the "third space" predicament of tributary literati, often expressing a "dual loyalty" to both China and Ryukyu. Additionally, due to the authors' contextual identities, the depictions of Weiyang exhibit thematic diversity.

【Keywords】Ryukyu; Weiyang (Yangzhou); East Asian Sinosphere

伴随着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建立，汉文化也以中国为核心向周边藩属国进行辐射，形成东亚汉文化圈，成员皆以汉字作为官方书面语，接受儒学教育，因此留下大量可资研究的汉字文献资料。纵观近五百年的宗藩关系史，中琉两国之间的封贡交往尤其代表性，琉球以每两年为期，派遣使团进贡。琉国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士大夫阶层深受汉文化熏陶，更有作为“闽人三十六姓”后裔的久米村士族群体。宗藩关系下，各藩国定期朝贡，进贡路线相对稳定。扬州旧称维扬，作为京杭运河水路重要节点，自古以来经济发达、不尽繁

盛之至，在历代文学作品中书写不断，逐渐作为一种象征繁华的文学符号而广为传播。藩国文人本就受汉文化影响颇深，又由于维扬水陆交通发达，朝贡途中多有途径，因此东亚文献存留汉诗多见维扬相关书写，其中又以琉球文献为最。

借助对以清代琉球文献为中心、结合东亚各国汉诗的维扬书写研究，关于汉文化在藩国如何行使教化职能、藩国文人身处宗藩两国之中的“第三空间”所具备的复杂性、由于作者身份差异导致的维扬书写产生多元性，这些问题都得以清晰呈现。

1 “讹传自是因彰善”——露筋烈女叙事的教化职能

露筋祠位于今江苏省高邮县，清时置高邮州，隶属于扬州府，有典云：“今昔姑嫂二人，夜至此，蚊太多，嫂投田舍房屋，姑不肯入，被蚊咬死，其筋露焉，土人为立庙，号露筋烈女”。关于典故来源，历来多有争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相传江淮间有驿，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蛄噉，血滴筋露而死。”其书还征引南朝人江德藻《聘北道记》：“自邵伯棧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只是故事主体由醉汉变为鹿^[1]。宋米芾《露筋之碑》载：“则泽国之女，嚼肤露筋，不就有帙之子，氏不显于一时，祠方揭于千古。”清徐昂发的《畏垒笔记》辨正诸说之伪，“谓本祀五代人路金，以路金有恩德于兹乡，故立祠庙；后讹为‘露筋’”^[2]。

就其传说而言，早期的说法带有志怪性质，尚属民间传闻范畴，夸张不足信；而最迟至宋代，其说变而为“露筋烈女”，相关作品除《露筋之碑》外，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也作《憎蚊》诗：“哀哉露筋女，万古仇不复。”以为支持^[3]。对于露筋传说的这一转变，或可从当时社会风尚的变迁中一窥缘由。有宋一朝推崇程朱理学，礼教森严，纲常伦理思想成为社会主流共识，相较于最初的“醉汉露筋”或“鹿筋”说，“露筋贞女”的传说显然更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露筋贞女”作为“烈女叙事”的典型，由士大夫阶层加以改造宣传，成为一种教化手段，其脉络分明可见了。其后诗作不绝，即便有着部分文人辨正诸说的尝试，如徐昂发的“路金”之说，但并不能改变“露筋贞女”说的主体地位。行至清朝，康熙南巡途径露筋祠时题匾“节媛芳躅”；乾隆皇帝亦为此事作诗两首，《露筋祠》：“呐噉何能致命戕，扑缘露处亦何妨。讹传自是因彰善，实录芳踪异失唐。”^[4]及《露筋祠口号》：“蚊噉安能致命亡，露筋事半属荒唐。虽然事可风巾帼，善善何妨思欲长。”^[5]如此种种更是从统治者的角度为露筋传说作了官方背书，由此“露筋”之争尘埃落定，辨正诸说的尝试也就失去了意义。“讹传自是因彰善”一语为“露筋贞女”说定性，清廷借助“彰善”逻辑将露筋祠的“贞烈”叙事纳入儒家教化体系，其事荒唐与否不再重要，“彰善”才是终极目的。就此，“露筋”典故完成了从早期的志怪传说到教化工具的转变。

完成转变后，露筋贞女在清诗中多有提及，诗僧岑霁《露筋祠》较具代表性：“沙草凄迷烟树昏，荒祠寂

寞托贞魂。灵旗高卷秋风晚，惟有清淮照墓门。”诗歌颂扬露筋女贞烈主旨明了，切合沈德潜的评价：“赋此题者多粘腻近腐，王渔洋以写景别行一路，为避俗也。作者同一写景，而意言之外，仍表其幽贞，故自耐人寻味。”^[6]其所谓王渔洋之作即王士禛《再过露筋祠》，诗曰：“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7]不同于历代传说中的村女形象，本诗中的露筋女佩羽戴玉，俨然贵女形象；次写其贞女塑像所处环境，其祠立于湖波之上，周遭绿树葱郁、湖云缥缈，一派清幽中也为神像衬出神秘之感；末句写诗人所见，以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象征露筋女之高洁，正合沈德潜“别行一路”之语，纵然诗作别行一路，仍不出彰表贞烈窠臼。

明清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日趋完备，儒家道德教化体系借此在藩属国广为传播，在强化对藩属国的意识形态辐射的同时，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构筑东亚文化共识，露筋贞女故事作为“彰善”逻辑典范，顺势融入东亚共同的“烈女”叙事网络，形成贞烈叙事的文化符号。朝鲜李氏王朝自明时便向中国纳贡，成为汉字文化圈重要成员，朝鲜汉诗涉及露筋者，有尹愔《苦蚊》与申绰《烈女沈夫人墓碑》两首。《苦蚊》一诗从题目到内容颇类欧阳修《憎蚊》，全诗扣题，写诗人不堪盛夏蚊啮，只于末句提及露筋之事：“露筋贞妇应哀诉，天帝胡宁忍汝生。”^[8]《烈女沈夫人墓碑》一诗纯为烈女叙事，“是以江介彰鬻伊之迹，泽国表露筋之节。”^[9]一语则以露筋旧事作为典范，彰表沈夫人之贞，足见儒家思想教化之果；就琉球而言，清代琉球汉诗中涉及露筋传说的诗作共四首，分别为：程顺则《晚泊露筋祠》、蔡大鼎《望露筋祠》、郑学楷《湖中望露筋祠》、向克秀《露筋祠》。四首琉诗皆于出使途中，使臣途径露筋祠时所作，且四首诗作主题都围绕赞扬忠贞而行，兹录其二论之。蔡大鼎《望露筋祠》：“露筋贞烈古来无，蛟聚奚为手不驱。深恐璫磷亏介节，甘心野宿丧微躯。”此诗上有前言：“今昔姑嫂二人，夜至此，蚊太多，嫂投田舍房屋，姑不肯入，被蚊咬死，其筋露焉，土人为立庙，号露筋烈女。”^[10]诗歌开门见山，“露筋贞烈古来无”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倾向；末句诗人以代言形式，用“深恐”“甘心”二句表现露筋女之贞烈，亦暗含规训。郑学楷《湖中望露筋祠》有：“忠孝本性真，何必光青史。我今初北游，采苹思沼沚。”^[11]二句，前一句依然是称赞露筋女之贞节；“采苹”出自《诗经·召南》，在经过“断章取义”后，引申为彰显忠信。此句不同于蔡诗，在彰善之外，引“采苹”典

故暗表忠心，是“事大”外交策略的体现。鉴于四人分别具备藩国使臣与官生身份，结合典故含义，此创作行为信非偶然，其目的也就不难推测了。其一，为宣扬当朝封建纲常思想，同时迎合统治者喜好，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可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风向；其二，作为藩国使臣，这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借宣扬忠贞观念、表达己身忠信之心，以代琉国表忠心耳，体现出一定的外交属性。同时，琉球文人对于露筋祠的书写，在逢迎之外，未必不是诗人在儒学礼教濡染之下，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也体现出琉球作为汉文化圈一员，其所产生的东亚价值观念共鸣。

作为具备“教化职能”的手段，露筋祠书写在不同的政治主体手中，其工具化的路径也各不相同。就有宋以后的统治阶级而言，露筋贞烈叙事是由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改造定性，从而发挥自上而下的教化功用，是社会风俗的上层导向与下层接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于琉球、朝鲜等藩国文人主体而言，他们既由于自身的儒学素养而接受露筋书写的贞烈内核，同时出于政治的考量，而将露筋叙事作为“诗赋外交”的手段加以运用，在迎合“彰善”需要的同时，可视为对宗主国价值观的主动迎合，暗含藩国文人的政治表态。

2 “慕华”与“思乡”——琉球文人的“第三空间”处境

作为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人物，霍米·巴巴(Home Bhabha)创造性提出了“第三空间”与“混杂性”概念，即在西方殖民化推进过程中，殖民与被殖民双方在此语境下互相杂糅，从而形成“第三空间”，由此产生的文化定位具备“混杂性”^[12]。尽管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根于十五世纪末出现的殖民主义，但他对异质文化互动复杂性的讲述意外切合明清两代的东亚封贡体系下的宗藩往来。在明清封贡体系下，各藩国论及“混杂性”者当以琉球为最，这既是宗藩交往的普遍性，也是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带来的独特性。琉球国对华纳贡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洪武年间，《明史·琉球传》载：“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13]这些移民最终定居琉球久米村，琉球国王专设“久米村协理府”，其中更有主管对华事务的“唐荣司”，一应官职皆由久米村出身文人担任。闽人三十六姓源于中国福建地区，而于琉球扎根，最终成为当地土族。与此同时，作为藩属，琉球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士大夫阶层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受汉文化熏陶，“与朝鲜、越南等国一样，琉球作为藩属之国‘向慕华风’，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心理。”^[14]加之琉球官生派遣制

度，即琉球文人以官费留学生身份来华学习，见于《明史·琉球传》：“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15]在封贡体系下，琉球以两年为期遣使朝贡，使团成员多为上述久米村士族与来华官生两个群体，今存琉球汉诗涉及维扬者，便是使团成员于朝贡途中所作。在来华琉球文人之中，既有作为拥有华裔与琉人双重身份的久米村士族，也有“向慕华风”的本土文人，他们的心理是相当独特的。“就文化身份而言，混杂性是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总是相互碰撞的，而这种碰撞和交流就导致了文化上的混杂化”^[16]久米村士族牢记其华裔血脉，家族子弟时赴闽进行祭祖，与华儒进行唱和交游，即便文有所成者如蔡大鼎，在来闽刊刻诗文集时也务必“就正于华儒”，表现出浓厚的华裔身份与汉文化认同感；而琉人群体则以“天朝上国”的眼光看待中国风物，赞叹之余亦下意识与故国进行两相对比。同时作为藩国文人，他们远游异国时又常抽离其外，难以身心投入他乡景色。琉球文人的这种复杂心理，正是由两种文化身份的碰撞而导致的。两重心理交织，反映在诗文创作上，便呈现出“双重忠诚”的特征。一方面，面对大好河山、如许美景，琉球文人热情赞颂、尽情描摹，甚至表现出“慕华”心理；另一方面又下意识地游离其外，面对维扬盛景，却常常难以投入身心，反而发出思乡之叹。

在慕华心理的影响之下，琉人汉诗中常常自觉地显露出对于天朝上国风物与文化的忠诚，常体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郑宗善《咏松菊》一诗便将对于宗主国的憧憬向往展露无遗：“此间何处有丹丘，紫气常盈帝子楼。此日羣仙望南极，一齐骑鹤上扬州。”^[17]《中山诗文集》序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翰林汪先生奉皇帝命，来中山三日，而涉大海。”^[18]本诗即为郑宗善为汪楫祝寿所作，诗人并非身临扬州，诗中涉及扬州的书写一定程度上形同“卧游”。“丹丘”为传说中神仙居所，“紫气”为祥瑞之气，古人以此为贵，“帝子楼”指越王楼，三者在文学上的象征皆极高极贵，本诗首句将琉球与中国作高下之比，暗贬琉球以衬中国，语气中不无奉迎之意；“南极”即指寿星，又称南极老人星，意为祝寿之意，其后“骑鹤上扬州”之语，“骑鹤”本指道家神仙乘鹤云游，与“上扬州”这一具体行为相结合，文学想象便落到实处，便将去往扬州这一现实行为的观感无限拔高，与与虚无缥缈的成仙并列。同时，对于前往扬州的描写历来有“上扬州”与“下扬州”之别，谷曙光对此曾作解读：“虽然一字之差，但鲜有误用，

足以说明古代文士对此典故是有斟酌的。但凡表达升官发财、享受人生，或追求升天得道的，多把十万贯、骑鹤和‘上扬州’联系起来，这往往是精神上的虚指；真的要去扬州，则用‘下扬州’居多。”^[19]一方面由于汪楫长于扬州，此为迎合其经历；同时也表达了藩国文人对上国繁华的不胜向往，呈现出浓郁的“慕华”色彩，这在蔡大鼎《过三叉河》一诗中亦有体现：“卓凌关塞水光摇，三派洪波屈曲潮。见说寺前多胜概，御花园里物华饶。”^[20]首联以动态意象构建壮阔图景，描写出水光潋滟的胜景，不胜赞美之至，末句话锋一转，将所见证的如许胜概归因于“御花园里物华饶”，慕华心理可见一斑。除了对维扬繁华的憧憬赞美，琉球官生来华学习体验，势必对于文化制度方面有切身体验，对比之下，感慨故国之不足，叹息怀才不遇，也在诗作中有所表达，体现出对中国制度的忠诚。如东国兴《经过大江嗟龙潭》：“又到金台感昔事，威风但向穷陬鸣。明珠还恐沧波闭，旦复把酒行高歌。黄金台上秋云多，滔滔东去滹沱河。”其前言云“道光辛丑余游学京师，过扬子江有‘却思故国龙潭小，空屈三霄飞跃心’之句。”^[21]“龙潭”为首里城北侧一处人工池塘，诗人昔日作为官生游学中国之时，表面是比较故国龙潭与中国长江，实则体现了诗人初来上国之际昂扬进取的心态。但多年之后诗人故地重游，经过大江再发感慨，自比“威风”“明珠”，却遭埋没，只得旦夕饮酒高歌，借战国时期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典故，抒发胸中块垒。两相对比之下，慕华心理分明可见了。

纵然上国丰饶，究竟非故乡，在途径维扬之余，琉球文人们并非一味沉醉于他乡景物，反而常怀乡愁，游离在维扬繁华之外，体现了内心对故国的皈依。试见程顺则《雪堂燕游草》，记载了诗人朝贡往返途经维扬的心路历程。《乡梦》：“分明昨夜在家乡，召入王门赐酒浆。晓角忽惊人好梦，醒来残月照东厢。”^[22]诗人途径维扬，夜半忽生乡思，恍然前夜还在琉球故国接受召见，如今已在异国他乡。诗中两处对比，梦中昨夜与今朝梦醒之比，突出诗人感官上时间流逝之疾；君王设宴与梦醒月照东厢之比，以故国欢饮景象，突出如今孤寂冷清，不言思乡而乡愁顿生。《广陵月夜闻笛》：“林壑生清籁，深秋首独搔。月怜炀帝地，客逐广陵涛。杨柳吹何处，关山调渐高。不堪愁里听，相思乱江皋。”^[23]诗人秋夜忽闻笛声，独自搔首沉思。随后引隋炀帝旧事，“客”字则点出作者身份，即他乡之客；“关山”古称陇山，因其险峻难度，诗人常用以感叹征戍思乡之苦，本诗作于程顺则入京途中，行程越久，离乡越远，

思乡之情也就愈发浓郁，有“调渐高”之叹；末句更是直抒胸臆，关山之调引动乡愁，以至于诗人独自思乡凌乱。《过扬子江》：“淮阳水阔放船宽，吴越山川纵目看。归客帆樯冲浪急，连天星斗过江寒。断烟日夜浮空际，胜地东南壮观。一叶飘然芦荻外，沙鸥无恙喜安澜。”^[24]本诗则作于诗人归途，由于使命完成，心态闲适，因而归诗基调与前两首大不相同。诗人乘舟过江，所见山高水阔，不胜纵览，实则是作者心境开阔所致；诗人归心似箭，于是所见之下船帆冲浪，星斗过江，沿途东南盛景也壮大可观；末句“沙鸥无恙喜安澜”写水鸟无恙，实是诗人对于归途一帆风顺的祝愿与欣喜。《乡梦》《广陵月夜闻笛》两首作于朝贡途中，基调凄清忧愁；《过扬子江》作于归途，心境开阔轻快，作者往返途中心境的变化，体现了内心对故乡的忠诚。

程顺则为琉球大儒，被列入“琉球五伟人”，为“闽人三十六姓”后裔，精于儒学，参照中国官制礼仪对琉球制度进行改进，创立“明伦堂”进行儒学教学；多次赴华刊刻诗集，与华人大儒交流学习。程顺则身为华裔琉球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琉球本国声名显赫至极，但其在琉球进行的活动无不显示着向中华文化靠拢的倾向，他的“中国-琉球”的双重身份显然位于中琉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这也是一批批琉球来华文人“混杂性”心理的缩影。

3 “卧游”体验与身份语境叙事

伴随着明清时期东亚封贡体系的建立，以琉球、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周边国家为代表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其显著特点便是以汉字作为官方书面语，留下大量汉字文献。对于各藩国文献所存留的的维扬汉诗而言，就内容可分为诗人亲身经历与本土“卧游”书写；就作者身份又分别有使臣、诗僧、羁客与官员等，由于身份的不同，各国文人在作品中对于诗歌节奏与意象风格的选择也就存在差异，试以论之。

“卧游”语出《宋书·宗炳传》：“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25]宗炳为南朝宋山水画家，他的“卧以游之”原指在画作中神游山水，以此“澄怀观道”。后来“卧游”以此逐渐引申，非但不局限于神游作品的种类形式，还为异域文人所接受发扬，“13世纪中期，卧游在朝鲜半岛渐兴，至16世纪已盛行。与宗炳卧游所不同的是，朝鲜文人的卧游对象并不局限于自己年少游历之所，而是多与中国山川丽水有关。举凡与中国胜景有关的媒介物，诸如文字游记、屏风画册、假山园林等，均可作为卧游对象。”^[26]可为印证。在宗藩外交的背景下，

各藩属国都接受汉文化熏陶，对中国山水名胜以及各地繁华不乏憧憬。但彼时交通不畅，中国由远隔重洋，难以亲身游历的藩国文人便多通过文学上的卧游，将自身对上国繁华的想象付诸笔端，以此“澄怀观道”。在琉球汉诗所存维扬书写中，琉球文人笔下的“维扬”，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汉文化熏陶后，从文学典故中以想象建构而成，这些作品虽非切身体验，但也折射出琉球人对维扬意象的阐释。如《圣览诗文稿》中《梅花叠韵歌》：“渴止三军岂不良，啖尽一斛却无妨。美人相逢酒肆傍，何逊扬州意兴长。”^[27]此处“美人”代指梅花，汉诗中咏梅者甚多，不乏将其比作美人者，如宋林逋甚爱梅花，乃至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梅花叠韵歌》中诗人并未身至维扬，而是在脑海中想象维扬胜地的繁华享受，借以衬托此刻的畅快体验；又如日本别源圆旨《寄维扬故人》一诗“万里八九月，秋风满林树。君东兮我西，此心如何说。大江滚滚流，昼夜无间歇。淮山万里重，嵯峨高突兀。丈履践，震雷苏越。出毒龙渊，入猛夫虎穴。夺得德山手里棒，等闲折落天边月，阿呵呵也太奇。维扬城里琼花树，昨夜剩开三两枝。江南江北人未知，一狐疑了一狐疑。”^[28]别源圆旨身为日本诗僧，其诗典故意象的选择暗含禅机，如“夺得德山棒”化用唐代德山宣鉴禅师以棒接机的典故，暗示破除我法二执；“折落天边月”则暗合永嘉玄觉“一月普现一切水”的禅理，喻指直指心性的顿悟。纵观此诗，诗人对于维扬的书写充满险奇，“淮山万里”、“震雷苏越”、“毒龙渊”与“猛虎穴”等皆为虚写，是诗人对于与维扬友人之间山水阻隔的虚写，越是描写路途之险峻，越能体现诗人与友人之间的深切思念，这样的夸张想象自然也是诗人卧游所得。而对同类型事物的卧游描写，又会因身份差异显出不同的意味。如朝鲜文人卞季良《琼花图》：“乾坤独树钟清气。今古名花复几株。嘉种只应天上有。异香曾是世间无。纷敷自爱盈枝雪。凋谢谁看点地珠。对画也堪忘寝食。神仙枉驾信非诬。”^[29]一诗纯从观赏角度出发，诗人神游画图之中，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琼花的洁白无瑕、盛放与凋谢的轮转以及扑鼻异香，深得卧游趣味，以致废寝忘食；对比琉球蔡铎《观琼花图》：“广陵宫观有仙葩，玉叶春深自放花。雪浪堆成原异本，水晶妆就更无瑕。一从阆苑修花史，遂令江都失故芽。犹幸画图堪共赏，始知此种出天家。”^[30]同为对琼花图的卧游描写，身为来华贡使的蔡铎在观赏之外又带有颂圣意味，此诗对琼花极尽溢美之词，只为引出最后“始知此种出天家”的感叹，明写琼花之美，实为颂扬上国物产之繁华。

同时，对于描写亲身体验的维扬诗作，其作品也会因为创作主体身份的流动而产生主题、内容上的区分。在这类诗作中，多有咏及扬州繁华胜景者，如蔡铎《邗关泛月》：“空江晴月散邗关，偏照劳臣一苇间。喜见水光明似练，敢忘君命重如山。满天星斗孤帆白，终日风尘两鬓斑。舟过维扬名胜地，且将杯酒破愁颜。”^[31]诗中“劳臣”、“君命重如山”、“终日风尘”等多次强调自己的使臣身份，同时铺垫了自身因为操劳而奔波沧桑的姿态；但即便重负在身不敢或忘，在得见维扬美景之后，诗人也仍能获得片刻的抚慰，饮酒消愁。又如蔡大鼎入贡途中所作《高邮放棹》：“多少楼船彩旆鲜，锦帆连驶孟城边。夹河杨柳含春色，明媚风光又一年。”^[32]全诗基调清新明快，充满了诗人得见维扬明媚春光以及楼船画舫等繁华景色的喜悦之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洪元燮《赠沈郎》及闵齐仁《广陵观灯》两诗，洪诗通篇有年华易逝、岁月沧桑之叹，“维扬地偏僻，举目愁渺渺。采山无可茹，钓水不见鳔。独与虎为邻，夜夜心战掉。”^[33]在与友人念及维扬时更是语出惊人，在他们口中，不胜繁华的扬州地区不仅偏僻闭塞，更是物产贫瘠、险恶异常，这样有悖常理的描写在下文得到了解释“俗学病粗剽，吾衰竟何述。……春来常早起，但向田间遶。溪禽唤策砮，山花笑笠纠。入门对案食，所爱膝前绕。”不同于蔡氏二人使臣身份的约束，久居他乡的洪元燮早已心生归志，惟愿归去享受天伦而已；闵诗又辟蹊径，先写其广陵观灯所见“照彻山河堪覩隙，射穿星汉亦凝晶。华谯杀箭迟迟下，绮陌游尘冉冉横。何处斗妆钩画箔，谁家按拍捻瑶笙。虚明幻界三千遍，晃朗层城十二清。”极言灯会之璀璨绚丽，末了笔锋突转，“试看轻佻人安在，自是危亡祸所婴。胜地伟观犹不泯，佳辰浪费几相丁。维扬侈汰须裁革，敕罢观灯厚有生。”笔触冷峻，带有强烈地批判之意，直言过度奢靡乃是“危亡祸所婴”，同时从维护民生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维扬侈汰须裁革，敕罢观灯厚有生。”^[34]此诗欲抑先扬，华丽目眩的观灯景象与严厉锋利的批判之语形成震撼人心的对比，具有此类维扬诗作中罕见的民本思想，这与作者的身份密切相关。闵齐仁生平仅有一次出使明朝的经历，即1544年朝鲜朝中宗薨，他被任命为告讞请谥请袭使出使大明，此诗应当作于途中，面对国事剧变，诗人自然难以全心投入身心的享受之中，反而因此得以保留清醒的笔触。而在此之前闵齐仁历任司谏院大司谏、司宪府大提学、刑曹参判等职，尤其是任职大司谏的经历带给他敏锐的眼光，让他能够透过盛况看到其背后对民力的浪费，两相结

合之下，付诸笔端便是冷峻的批判文字。

遍观东亚汉诗中涉及维扬的诸多作品，可看出作者的流动性身份带来了诗作内容的多元化。同样写维扬景物，本土卧游作品基于特定的文学想象，反映在作品中则是根据节奏需要而呈现出理想化或险恶化描写，带有失真性；诗人亲身经历的作品则无此弊，而是根据诗人不同身份呈现出维扬的不同侧面，同样维扬名胜，在身负政治任务的使臣眼中则赏心悦目，作品中带有“慕华”色彩；而在忧国忧民的官员眼中，繁华背面奢靡侈汰的一面便会放大，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批判性。

4 余论

“由物候变化所产生的陌生化体验最易引发去国怀乡之感。……琉球气候四季温暖，冬无降雪，蔡大鼎作为岛国人士，对中国大陆由南到北的气候变迁体会尤其深刻。”^[35]藩国文人在羁留异域时，常采取“他者”视角观照自身，作品中时常以“客”“征人”“羈臣”作身份自述，这既是对自身他乡之客的时时强调，同时也在诗歌中留下了异域体验的痕迹。如琉球文人蔡大鼎《舟过扬州》：“征人到北燕”^[36]程顺则《广陵月夜闻笛》：“客逐广陵涛”蔡铎《邗关泛月》：“偏照劳臣一苇间”；又如朝鲜曹兢燮《客晚留广居堂》：“烟月客维扬”^[37]……这些描写在强调身处于异国他乡客体身份的同时，也多塑造出风尘仆仆的征人形象，这样有意识的形象塑造也一定程度反映出作者创作时的心态。蔡大鼎《舟中春寒》一诗便描写了其途径维扬畏寒的异域体验：“过客朝朝夜放船，春寒不似故乡天。题诗笔尚宜呵冻，两岸杨花锁暮烟。”^[38]从内容可推知在这一段行程中，诗人多于夜间行船，料峭春寒殊异于故国；“题诗笔尚宜呵冻”极为形象地描写了天寒笔冻，难以下笔的情形，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再如程顺则《维扬遇雪》：“匹马维扬道，霏霏觉惨凄。冻云凝废井，衰柳软长堤。”^[39]诗人单人匹马行于维扬道中，雨雪霏霏、连绵不止，正是凄凄惨惨之状；路边所见皆是废井冻结、柳丝衰颓，“惨凄”“冻云”“废井”“衰柳”等意象结合，诗人苦寒之态跃然纸上。这种体验对于同属岛国的朝鲜文人而言亦不陌生，见曹文秀《夜泊广陵》：“沙鸟惊栖人不寐，满江风露一船寒。”^[40]此诗亦写出诗人途径广陵时，难耐风寒露重的情态。可见作为藩国文人，在同处异国他乡之际，某些物候体验也有共通之处。

综上所述，在宗藩外交的大背景下，各藩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中“露筋贞女”叙事在清代完成彰善教化工具的转变后，为各藩国所接受，顺

势融入东亚共同的“烈女”叙事网络，形成贞烈叙事的文化符号；次之，由于藩国文人同时具备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与故国情怀的坚守，这种“双重忠诚”便构成了宗藩关系下的“第三空间”，这种文化处境在身为“闽人三十六姓”后裔的久米村士族身上尤为明显，具有复杂性；同时，由于东亚维扬汉诗作者身份不一，这种身份上的流动性反映在诗作上便体现出风格取向的多元性；最后，身为异域文人，使团成员在维扬书写中常以“他者”视角进行观照，诗人不仅时常强调自身“他乡之客”的身份，同时在针对异国他乡的物候、温差体验，呈现出独特的异域体验。对于“维扬”主题在域外汉诗中的意象呈现，承载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这既是文化史、交通史所应关切的问题，又是诗学史所应关注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段成式著，张仲裁译注：《酉阳杂俎》，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923 页。
- [2] 徐昂发著：《畏垒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4 页。
- [3] 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 1986 年版，第 19 页。
- [4] 乾隆：《露筋祠》，《钦定四库全书》，《御制诗集》二集卷六十八。
- [5] 乾隆：《露筋祠口号》，《钦定四库全书》，《御制诗集》五集卷四。
- [6] 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377 页。
- [7] 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37 页。
- [8] 尹愔：《无名子集》，《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 [9] 申绰：《石泉遗稿》，《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 [10] 蔡大鼎撰：《北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8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9 页。
- [11] 孙衣言辑《琉球诗录》，《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31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7 页。
- [12] 严苡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以《西游记》韦利译本为例，社会科学战线 2021 年第 1 期。
- [13] 张廷玉等编：《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一卷，清乾隆四年

- 武英殿刊本.
- [14] 张明明.琉球久米村蔡氏家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 2019 年第四期.
- [15] 张廷玉等编:《明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一卷,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
- [16] 王宁,生安锋,赵建红著:《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1 页.
- [17] 程顺则编《中山诗文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30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 页.
- [18] 程顺则编《中山诗文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30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 页.
- [19] 王璐.“上扬州”和“下扬州”有何不同 《扬州日报》2024-3-3.
- [20] 蔡大鼎撰:《北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8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5 页.
- [21] 东国兴撰:《东国兴诗集》,《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6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7 页.
- [22] 程顺则撰:《雪堂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5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7 页.
- [23] 程顺则撰:《雪堂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5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7 页.
- [24] 程顺则撰:《雪堂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5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0 页.
- [25] 沈约撰:《宋书·宗炳传》,列传卷第五十三,《百衲本二十四史》.
- [26] 严艳.论越南使臣的“潇湘”书写——兼与日本和朝鲜半岛“卧游”比较,《国际汉学》2024 年第 1 期.
- [27] 蔡大鼎撰:《圣览诗文稿》,《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9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6 页.
- [28] 别源圆旨撰:《南游东归集》,日本国会国立图书馆藏写本.
- [29] 卞季良撰:《春亭集》,《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 [30] 蔡铎撰:《观光堂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30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5 页.
- [31] 蔡铎撰:《观光堂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30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6 页.
- [32] 蔡大鼎撰:《北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8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0 页.
- [33] 洪元燮撰:《太湖集》,《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 [34] 闵齐仁撰:《湖阴杂稿》,《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 [35] 张明明.文学书写中的晚清邮驿场景——以琉球文献《北燕游草》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
- [36] 蔡大鼎撰:《北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8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5 页.
- [37] 曹兢燮撰:《岩栖集》,《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 [38] 蔡大鼎撰:《北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8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2 页.
- [39] 程顺则撰:《雪堂燕游草》,《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 25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9 页.
- [40] 曹文秀撰:《雪汀诗集》,《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